

四库提要诸本分析

——以《四库全书总目》本为优

崔富章

四库提要的具体所指有:七阁库书提要,或称“原本提要”,指《四库全书》所收三千四百种图书^①,每种皆冠《提要》一篇;七阁《总目》提要,指四库馆缮写本《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含库书提要加存目提要,并四部总叙、四十三类小序暨子目案语等核心内容),分置《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之首。此外还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武英殿聚珍版书》所载《提要》近六百篇,以及邵晋涵、翁方纲、姚鼐、戴震、周永年、任大椿等人的《四库提要》分纂稿,等等。《荟要》内四百六十三篇提要,《聚珍版书》内百余篇提要,经总纂官纪昀等删润、修改,已经写入库书提要之中;邵晋涵等分纂稿,皆为草稿、初稿,经纪昀等删改,亦已写入库书提要。可以这样说,库书提要和《总目》提要,是四库提要之主要载体。

库书提要和《总目》提要,同为四库提要之主体所在,其共有的部分(三千四百六十余篇),理应一致。“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今日传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各阁《全书》的书前提要,彼此都不尽相同,尤其是《四库荟要》各书的提要,差别尤大。笔者曾一一持之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比对,发现同一种书而《提要》完全不同的达二七一种之多。其它固然差别不大,但文字内容也略有出入”^②。就我所经眼的而论,库书提要与《总目》提要,没有一篇是完全相同的,具实质性差异者不胜枚举,大不同者亦不乏其例。库书提要和《总目》提要,都出自纪昀等总纂官之手,却为何如此不同?何者代表四库提要的最高

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含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篇提要,除去存目,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篇。但是不能据此推定《四库全书》内所收图书种数,因为有些篇提要实包括两种书以上。例如卷八十八史部史评类《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前编十八卷外纪一卷举要三卷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一条,库书实分作三部,有三篇提要,其中第二部《通鉴纲目前编十八卷外纪一卷举要三卷》内又含两种书,《外纪》一卷系元陈桱编撰,非金履祥作品。统计《四库全书》内收书种数,既不能依《总目》提要条目,也不能简单依据库书提要篇目,必须具体分析。这项工作尚未做好,只能举个概数。

②吴哲夫:《影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的学术价值》,《出版界》1986年1月特刊。

水平？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一、从文澜阁《四库全书》原钞本《东家杂记》提要说起

孔子四十七代孙孔传编撰《东家杂记》二卷，初名《祖庭杂记》，记曲阜孔氏文物故实，初版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靖康之变，孔传与孔端友（四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等随宋高宗南渡。《祖庭杂记》书版亡于金，绍兴甲寅（1134），孔传乃改作序年月，稍事增修，易名《东家杂记》重刊之。“改‘祖庭’为‘东家’者，殆痛祖庭之沦陷，而不忍质言之欤”^①。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将《东家杂记》全本辑入史部传记类“圣贤之属”，取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明刻本为底本。这个本子确非善本，钞写中复增讹误，《提要》受此影响，无论是库书卷前提要（乾隆五十三年），还是浙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五十九年），乃至武英殿据纪昀“校勘完竣”稿本刊刻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六十年），皆有严重失误，而又以文澜阁库书卷前提要为最。兹全篇录下（凡加黑点之字皆属讹误衍文，方括号内正字，圆括号内衍文，方框或长方框内补足脱文）：

臣等谨按：《东家杂记》二卷，宋孔传撰。传，字世文，至圣四十七代孙。建炎初，随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绍兴中，官至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封仙源县开国男。是编成于绍兴甲辰[寅]。上卷分九类：曰姓谱，曰先圣诞辰讳日，曰母颜氏，曰娶[并]官氏，曰追封谥号，曰历代崇封[奉]，曰嗣袭封爵沿改，曰改（改）衍圣公告，曰乡官。下卷分十二类：曰先圣庙，曰手植桧，曰杏坛，曰后殿，曰先圣小影，曰庙柏，曰庙中古碑、曰本朝御制碑、曰庙外古迹（柏、曰庙中古碑、曰本朝御制碑、曰庙外古迹）、曰齐国公墓、曰祖林古迹、曰林中古碑。其时去[古未]远，旧迹多存，传又生长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记特为简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异》一卷，末题“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谨书”。末[末]有《南渡庙记》一篇，题“宝祐二年（年）二月甲子汝腾谨记”。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称旧有尹梅津跋，此本无之。而后有淳熙[咸淳]元年叶[冯]梦得跋。盖三篇皆重刻所续入也。去疾《考》中，历驳诸家之误，而以为《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于十月二十一日，卒于四月十八日。其说殊谬。殆由是时理宗崇重道学，胡安国《传》方盛行，故去疾据以为说欤？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壬戌冬日，叶九来过芳[访]草堂，云有宋晁[槩]本《东家杂记》，因借[假]借缮写。此书为先圣四十七代孙孔传所称[编]。首列《杏坛图说》，记夫子车从，出国东门，因观[觀]杏坛，历级而上，顾[謂]弟子曰：兹鲁将臧文仲誓将[盟]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寒暑往来[暑往寒来]春复

^①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东家杂记》钱大昕题跋。辑入《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清嘉庆九年刊本。

秋，夕阳西去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考诸家琴史俱失载，附录于此。详具[其]语意，未知果为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按此语伪妄，不辨而明，曾乃语若存疑，盖其平生过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云[三]卷，此本实二卷；曾云“首列《杏坛图说》”，此本《杏坛》为下卷第三篇，且有说无图，亦无此歌。不知曾所见者，又何本也。其或说[误]记欤？乾隆五十三年三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①

乾隆五十九年（1794），浙江学政谢启昆主持翻刻文澜阁尊藏原钞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②，其卷五十七著录：

东家杂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孔传撰。传，字世文，至圣四十七代孙。建炎初，随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绍兴中，官至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封仙源县开国男。是编成于绍兴甲辰[寅]。上卷分九类：曰姓谱、曰先圣诞辰讳日、曰母颜氏、曰娶元[并]官氏、曰追封谥号、曰历代崇封[奉]、曰嗣袭封爵沿改、曰改衍圣公[固]、曰乡官。下卷分十二类：曰先圣庙、曰手植桧、曰杏坛、曰后殿、曰先圣小影、曰庙柏、曰庙中古碑、曰本朝御制碑、曰庙外古迹、曰齐国公墓、曰祖林古迹、曰林中古碑。其时去古未远，旧迹多存，传又生长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记特为简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异》一卷，末题“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谨书”。末有《南渡庙记》一篇，题“宝祐二年二月甲子汝腾谨记”。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称旧有尹梅津跋，此本无之，而后有淳熙[咸淳]元年叶[冯]梦得跋。盖三篇皆重刻所续入也。去疾《考》中，历驳诸家之误，而以为《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于十月二十一日，卒于四月十八日。其说殊谬。殆由是时理宗崇重道学，胡安国《传》方盛行，故去疾据以为说欤？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壬戌冬日，叶九来过芳[访]草堂，云有宋槧本《东家杂记》，因假借缮写。此书为先圣四十七代孙孔传所编，首列《杏坛图说》，记夫子车从，出国东门，因观[覩]杏坛，历级而上，顾[谓]弟子曰：兹鲁将臧文仲誓将[盟]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去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

①录自文澜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东家杂记》原钞本，新增标点、标号。1911年浙江图书馆大楼建成（位于孤山之阳，馆员俗称白洋房），文澜阁《四库全书》纳入图书馆领辖。建国后，库书移贮青白山居（馆内惯称杨虎大楼，处于孤山之巔）。上世纪七十年代，余家居斯楼朝西阳台间，得与库书结缘，爰有《四库提要补正》习作问世。

②文澜阁写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含库书提要三千四百六十一篇，存目提要六千七百九十三篇），一百二十五册，析为四部（绢面色彩不同：经绿、史红、子蓝、集灰，与库书一致），分置《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之首。详见嘉庆二十五年（1820）杭州承办盐商吴恒聚等造《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著录，浙江图书馆藏写本（文澜阁《四库全书》附藏）。

草闲花满地愁。考诸家琴史俱失载,附录于此。详其语意,未知果为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按此语伪妄,不辨而明,曾乃语若存疑,盖其平生过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三卷”,此本实二卷;曾云“首列《杏坛图说》”,此本《杏坛》为下卷第三篇,且有说无图,亦无此歌。不知曾所见者,又何本也。其或误记欤?^①

同为文澜阁尊藏,库书提要讹误二十四处,涉及五十馀字;《总目》本提要讹误十处,涉及十一字。两者皆未达理想境界,比较而言,《总目》提要优于库书提要,则是基本事实。

二、库书提要与《总目》提要之分析

库书提要讹误,北四阁亦时有发现。例如经部四书类宋郑汝谐《论语意原》二卷,文渊阁、文溯阁库书《提要》“汝谐,字舜举,号东名,处州人”^②。《总目》提要“汝谐有《东谷易翼传》,已著录”,依例不重述作者爵里字号,而于《东谷易翼传》二卷云:“汝谐,字舜举,号东谷,处州人。”郑汝谐自号东谷居士,文渊、文溯库书提要作“东名”者误。再如元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八卷,文渊阁库书提要:“明洪武三年初行科举,其《四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与《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盖犹沿元制。至五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总目》提要:“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文渊阁库书提要作“五十七年”者误,而以上整段文字,文溯阁库书提要全无。又如史部别史类《逸周书》十卷,文渊阁库书提要:“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合》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脱。”《总目》提要“月合”改作“月令”。文渊阁库书提要作“月合”者误,而文溯阁库书提要作“月令”,不误。前节所录《东家杂记》提要,“钱曾《读书敏求记》曰”至末尾一大段,文溯阁库书提要全无,它是“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校上”,比文澜阁库书早六年,修订机会相对少些。这足以说明,四库提要以库书提要为准则是不现实的,难以操作的。

现在,我们再以文渊阁库书寇准《忠愍集》为例,以展示库书提要与《总目》提要内容之差异。首先看书名之异。文渊阁库书提要题“忠愍集三卷”。文澜阁库书提要题“忠愍诗集三卷”。《总目》提要题“寇忠愍公诗集三卷”,小

①录自浙江翻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七,惟繁体改简体,新增标点符号。

②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所引文渊阁库书提要均出自此本。伪满康德二年(1935),奉天图书馆别录《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一百十四卷补遗一卷,委托辽海书社排印单行,浙江图书馆藏此书,本文所引文溯阁提要均出此。

字注“两淮盐政采进本”^①。按：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有两《忠愍集》，一为寇准（961—1023）撰，一为李若水（1097—1128）撰，都是三卷。北宋真宗时，辽兵入侵，寇准反对迁都南逃，力排众议，促使真宗亲征，达成澶渊之盟。后遭倾陷，卒于贬所。仁宗即位十年（1032），赐中书令，追谥“忠愍”。一百年之后，金兵迫城，李冰（若水）主和议，从钦宗入金营，以反对金人废钦宗，被断舌解颐（裂头）而死。逃跑途中的赵构，特赐观文殿学士，谥曰“忠愍”。两个“忠愍”，天渊之别。寇准推动真宗亲征，反对逃跑，为国家赢得百馀年的和平统一局面；李若水推动钦宗出降，君辱国破，一百五十馀年的南北分裂。但是，李若水前后表现，无不入清帝法眼。馆臣从《永乐大典》辑编李氏《忠愍集》三卷，乾隆特撰《题李若水忠愍集》诗一首并自注及题记，表彰李氏忠义，以维系他亲自肯定的“元继宋而不继辽金”^②之正统观；同时又称赞李氏识时务，“大金当革命之时，自非若水之所得而抗”，既比拟“汤武革命”，“大金”当然就变成了“正统”，乾隆皇帝内心深处的矛盾暴露无遗。凡涉及此类图书文献，馆臣无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竟把乾隆为李若水作的诗并注、题记等，增置寇准之书首，张冠李戴，进而依御制诗题，冠名“忠愍集”，致与李若水《忠愍集》重名，造成混乱。徵之寇准集传世各本，明嘉靖十四年（1535）蒋鏊刊本，卷端题“忠愍公诗集”；清康熙年间吴调元辨义堂刊本，卷端题“寇忠愍公诗集”，没有题作“忠愍集”者。考《四库采进书目》，“寇忠愍公诗集三卷，宋寇准著，一本”（《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寇忠愍公诗集三卷，刊本。宋尚书右仆射下邳寇准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寇忠愍公集”（《江苏采集遗书目录简目》）^③。从《四库采进书目》所载三部题名判断，同为康熙年间吴调元辨义堂所刻《寇忠愍公诗集》三卷。沈初编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详为著录云：“寇忠愍公诗集三卷，刊本。右宋尚书右仆射下邳寇准撰。乃近时依宋本校刊者。前有赠谥诰一道，及孙扑奉敕撰碑，又宋范雍、王次翁、辛敦三序。”^④所称“近时依宋本校刊者”，即辨义堂本。《总目》提要题“寇忠愍公诗集三卷”，得其实。文渊阁库书提要改题“忠愍集”，库书删去“赠谥诰……三序”多项内容，皆与底本不符。

再看内容之异。文渊阁库书提要：

①考《四库采进书目》所收《两淮盐政李呈送书目》、《续送书目》并失载。以理揆之，应该就是《江苏采集遗书目录》著录之《寇忠愍公集》，与《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之《寇忠愍公诗集》三卷，同为“近时依宋本校刊者”，即清康熙年间吴调元辨义堂刊本。按：《总目》提要每条皆注明底本来源，此乃遵照乾隆皇帝指示，旨在表彰藏书之家、采访之人。这就为后人探索、确认四库底本之版本，提供了重要线索。库书提要没有此项内容。

②语出元杨维禎《辩统论》，陶宗仪辑入《辍耕录》，乾隆下令补入杨维禎《东维子集》，全本抄写辑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③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92页。

④清沈初等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臣等谨案：《忠愍集》三卷，宋寇准撰。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太宗太平兴国中举进士，淳化五年参知政事。真宗朝累官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莱国公。乾兴初，贬雷州司户，徙衡州司马，卒。仁宗时赠中书令，追谥忠愍。事迹具《宋史》本传。初，准知巴东县时，自择其诗百余篇为《巴东集》。后河阳守范雍哀合所作二百余篇，编为此集。……准以风节著于时，而其诗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湘山野录》称其《江南春》二首虽体近小词而不失高韵，至所谓“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二句，以为深入唐格，则殊不然。“野渡无人舟自横”本韦应物《西磧绝句》，准点窜一二字，改为一联，殆类生吞活剥。准诗自佳，此二句实非其佳处，不足尽准所长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①

《总目》提要（卷一五二集部别集类）：

《寇忠愍公诗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寇准撰。准事迹具《宋史》本传。初，准知巴东县时，自择其诗百余篇为《巴东集》。后河阳守范雍哀合所作二百余篇，编为此集。……准以风节著于时，其诗乃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比。惟《湘山野录》尝称其《江南春》二首，及“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二句，以为深入唐格，则殊不然。《江南春》体近填词，不止秦观之《小石调》。“野渡无人舟自横”本韦应物《西磧绝句》，准点窜一二字，改为一联，殆类生吞活剥，尤不为工。准诗自佳，此二句实非其佳处，未足据为定论也。^②

两篇比较，《总目》提要删改润色亦复不少。“字平仲”以下七十九字，《总目》提要全删，于体例似略有不合。然寇准名相，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者，例行平平简介，实可有可无。在库书提要“而其诗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二语之后，《总目》提要大写“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比”二语，力透纸背，堪称点睛之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文澜阁库书提要题“忠愍诗集”，内容与文渊阁库书提要大不同，而跟《总目》提要接近，校上时间是“乾隆五十一年十月”^③，比文渊阁本晚五年。前举《东家杂记》，文溯阁库书提要“钱曾读书敏求记曰”以下全无，校上时间是“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比文澜阁本早五年。据此推断，七阁库书提要，缮写入阁有先有后，文本并不统一，其内容迭经修改润色，大致看来，是向着《总目》提要的方向递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总目》提要优于库书提要。这应该归

①录自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书提要，新增标点符号。文溯阁库书提要同。

②录自浙江翻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新增标点、标号。

③文澜阁库书于咸丰年间散出，后为罗振常收得，钐“蟬隐庐秘籍印”朱文方印。其卷上一卷，今藏南开大学图书馆（杨洪升：《文澜阁写本〈四库全书〉七种》，《文献》2010年第3期）。

功于总纂官纪昀的持续修订,“考据益臻详赡,文体亦复畅达”^①,全是以纪昀为首的专家高人修书治学的功劳。第一部《四库全书》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全部入文渊阁,由内务府掌管,与外界基本隔绝,后续增减调整,总量很有限。而纪昀案头的“别录”——《总目》提要,则可以日夕研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随得随改,与时俱进,到颁发文澜阁缮写本《四库全书总目》时^②,馆臣磨勘已逾十载,十年磨一剑啊!

三、《总目》版本:浙本、殿本

《四库全书总目》成书之后,陆续缮写颁发七阁尊藏,藏书条件极佳,可偏偏命运多舛。咸丰年间(1851-1861),南三阁遭殃,文宗、文汇全毁,阁、书俱亡,靡有孑遗,文澜阁沦为兵营,库书抛弃如敝屣,幸赖有乡贤如丁氏兄弟者抢救,战后归阁,不及三成,《总目》残存二十七卷耳^③。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文源阁、书俱毁。文溯阁写本《总目》于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日由陆锡熊带回北京“另缮”^④,直到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新缮本仍未送还^⑤。1977年7月28日,钤有“文溯阁宝”的写本《总目》则由故宫博物院拨付天津图书馆收藏(残存一百四十三卷)^⑥。文渊阁写本《总目》则下落不明。文津阁写本《总目》,体例特别,提要内容极少,近似《简明目录》^⑦。由此说来,现存文渊、文溯、文津、文澜四阁《四库全书》中,惟有文澜阁尚有《总目》原钞本

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

②文澜阁缮写本《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八旬万寿盛典》提要:“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大学士阿桂等奏请纂修,五十七年十月告成。”据此推断,《总目》颁发至文澜阁的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七、八年之间。

③文澜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原钞本,残存二十七卷,分别为卷六四、六五、六九、七〇、七一、七八、七九、八〇、一二五、一四〇、一四八至一五三、一五六、一五七、一六二至一六五、一八三、一八五、一八六、一九五、一九六。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91页。

⑤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盛京将军琳宁等奏重校文溯阁书籍人员事竣回京折》称:“其《性理大全》一书,亦准刘权之撤出,带回另缮。至前次原任副都御史陆锡熊奏明撤回改缮各书,内除《南巡盛典》、《八旗通志》、《四库全书总目》三种尚在改缮,未经送到外,其余撤回各书俱已发来,照存记原档差点无阙,一并归架。”(《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04页)

⑥李国庆:《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前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9年,第2页。

⑦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传:“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馀种,卷帙甚繁,将其钞刻成书,翻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另列《简明确目》一编,祇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9页)文津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应该就是乾隆指示的“另列简明确目一编”,堪称《简明总目》。后来编纂的《简明目录》,仅二十卷,且不含存目。

二十七卷,算是“硕果仅存”了。

万幸的是,早在太平军入驻杭城(1861)之前,乾隆五十九年(1794),浙江人察觉《总目》提要的市场空间,迅速筹集民间资本,办妥审批手续,“恭发文澜阁藏本,校刊以惠士人”^①,次年工竣,面向全国发行,成为出版最早的《四库全书总目》第一刻本^②。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翻刻浙本。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漱六山庄、光绪二十年上海点石斋先后石印广东翻刻本。宣统二年(1910)上海存古斋、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东方图书馆、大东书局等先后石印浙江原刻本。民国二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铅字排印出版,形成浙本系列,浙本遍天下。特别是建国后,中华书局在1965年缩小影印浙江原刻本《四库全书总目》,并且多次重印,累计达数万部,浙本成为《总目》传播史上影响最大的版本,助推《总目》提要赢得“良师”美誉,居功至伟,可谓浙江民营事业早期成功范例之一。

早在《四库全书总目》基本成型之初,乾隆皇帝已经觉察到它对学者“考镜源流”之重要性,“令将《四库全书总目》及各书提要,编刊颁行”^③。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交武英殿刊刻颁行,垂示万世”^④。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原户部尚书办理四库全书副总裁曹文埴谨奏:“窃臣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览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谨刷印装潢陈设书二十部,备赏书八十部,每部计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其版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现交武英殿收贮。再,纪昀曾知会臣于书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贮四阁,兹一并印就,请饬交武英殿总裁照式装潢,送四阁分贮。”^⑤这就是起步甚早而竣工晚于浙江刻本的武英殿刊本^⑥。一个半月以后,乾隆正式下台,“陈设”、“备赏”云云,徒具空文,百部大书闭锁内府,自生自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所见仅存四部而已。

①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浙江翻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末附阮元《恭纪》。收入阮元《擘经室二集》卷八,题《浙江刻四库全书提要跋》。

②详参拙作《〈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三十五辑;《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2005年第1期。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11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出版说明》谓《四库全书总目》“在一七九〇至九四年(乾隆五十五至五十九年)间刻成颁行”,此说没有文献证据支持。

③《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37页。

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03页。

⑤《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74—2375页。

⑥详参拙作《〈四库全书总目〉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按,中华书局影印组1964年12月《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谓“浙本据殿本重刻”,此说源自王重民《论〈四库全书总目〉》一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双方都没有文献证据支持。

纪昀当时似有预感,特别知会曹文埴增印四部,送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北四阁度藏。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其中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底本正是纪昀关照分贮北四阁的武英殿刊本。这是殿本《总目》首次影印出版,不但比浙本《总目》第一次影印(石印)晚了将近一百年,而且与特大丛书《四库全书》捆绑,未能单独发行,承学者自然无力购置。此前,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二十五年,福建、广东(广雅书局)相继翻刻殿本《总目》,不但比浙刻《总目》晚了整整一百年,而且增辑入由他们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书》之中^①,与一百多种典籍捆绑发行,读者仍然难以购置。可以这样说,殿本《总目》自始至终传播管道不畅,总是局于一隅,锁在深闺人未识,学界徒知其名,乃至误传为“聚珍本”(活字排印本),它的实际影响力微乎其微。在《总目》传播史上,市场化的民营浙本,率先登场,独领风骚二百年,成为无与伦比的大宗。

殿本《总目》虽然传播受限,学术水平却是很高的,正如曹文埴《奏折》所言,它是依照纪昀“校勘完竣”即最终修订稿本,刊版刷印的,当然是最为成熟。乾隆五十八年颁发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缮写本之后,北京的纪昀等人并没有停止修改,束之高阁,而是毫不懈怠,润色删改,追求完美,一直到乾隆六十年九月,弘历下台日期已经昭告天下,成了过气皇帝^②,屡受申饬处罚的纪晓岚这才松了口气,总算“校勘完竣”,同样受过处罚的曹文埴也能放心地“加紧刊刻毕工”。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在北京图书馆看到过纪昀的修订稿本,残存六十三卷^③。纪昀据以删改的底本是四库馆钞写本,卷端题《钦定四库全书总

①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后,陆续出版《武英殿聚珍版书》一百三十八种,前四种刊印,余一百三十四种系木活字排印(由办理四库全书副总裁金简主持)。乾隆以“活字”名称不雅,改称“聚珍”,其中的《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就是所谓聚珍版。但是,总量一百三十八种内,并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总目》乃由办理四库全书副总裁曹文埴主持,由武英殿刊版,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完成刷印装潢。乾隆四十二年,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一百二十三种,道光、同治、光绪时期续增至一百四十八种,包括光绪二十年重刊殿本《总目》增入其中。光绪二十五年,广州广雅书局又重刊福建本,改题《武英殿聚珍版全书》。

②《清史稿》卷十五《高宗纪》:“九月辛亥,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人见,宣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二十五史》本)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立太子,更像是立皇帝。

③国家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存六十三卷(卷一、二、四、五、九、一五、一七至二二、二五、二九、三八至四一、四五至四七、五一、五二、五六至七三、七六、一一七、一二六至一二九、一四一、一四二、一五〇、一五六至一五九、一六五、一六六、一七三、一七五至一七七、一八六、一八七、一九七)。《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作“清乾隆四库全书纂修馆抄本”,不确。国家图书馆王菡研究员有详确之辨证(“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目》，各《提要》文字内容与文澜阁《总目》提要一致，但凡修订删改之处，文澜阁《总目》提要全无，而与武英殿刊本《总目》提要一致。根据以上状况，参考曹文植《奏折》“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之说，笔者判断此六十三卷写本，正是乾隆六十年（1795）武英殿刊刻《总目》之底本的一部分，拙作《〈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认定为“纪昀等稿本”，“武英殿刊《总目》之底本”残卷^①。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就已经对校的部分判断，稿本残卷的修订意见，全部是正确的，浙本《总目》（即文澜阁写本）讹误。例如卷一百六十五《四明文献集》提要“盖据拾残剩，非其真矣”，稿本残卷改“真”为“旧”；《晞发集》提要“而节概亦卓然可观”，稿本残卷改“可观”为“可传”等等，比文澜阁《总目》提要准确，所以说殿本《总目》提要最为成熟，后来居上，这个基本判断毋庸置疑。不过，殿本的成熟，表现在政治方面的，把《提要》中凡是跟禁毁图书或被封杀人物有染的，统统删除净尽，斩草除根，而浙本《总目》提要，尚有漏网者，例如卷一百二十三《七颂堂识小录》提要：“国朝刘体仁撰。……惟苏轼所书《醉翁亭记》，《因树屋书影》以为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误为真迹，勒之于石。”殿本删“因树屋书影以为”七字，意在封杀周亮工，反而涉嫌“掠美”。涸泽而渔不好，文献亦如生态，多样性为美。

四、余论：《总目》提要之不足

我们说四库提要应当以《总目》为代表，是因为《总目》提要经过纪昀等大家的长年修订，改正了库书提要的大部分讹误，有资格代表四库提要之最高水平。当然不排除有例外情况。如元杨维禎《东维子集》，库书提要阐述“统系代嬗之义”，就比《总目》提要透彻。《总目》卷八十八史部史评类“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前编一卷外纪一卷举要三卷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一条，实际上包含三部图书：第一部是宋人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等集体编纂《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第二部是入元不仕的金履祥编撰《通鉴纲目前编》十八卷（《总目》误作一卷）举要三卷（内含元陈桱编撰《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外纪》一卷）；第三部是明人商辂等编撰《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总目》提要笼统一篇，而库书提要实有三篇，不仅眉目清晰，内容更充实，特别针对“用备宋、辽、金、元四朝事实”的商辂《续编》及其后周礼续为《发明》、张时泰又续为《广义》，颠倒是非，议论偏谬，甚至矢口谩骂诸条，提出严厉批判。如商辂《续编》“金禁女真人学南人衣饰”一条，本事是“金主谓从官曰：‘女真旧风，最为纯直，汝等当习学之，不可忘。’”，库书《提要》誉称“乃敦俭由旧之美”。《续编》推演为“禁学南人衣饰”，已经脱离史实，《发明》又横发议论：“用夏变夷，固为美事，奚必禁而绝之，特书曰‘禁’，深贬之也。”可谓不打自招，确属“吹毛求疵”、“议论偏谬”者。“又如巴拜以其子入见太子珍馐，珍馐

^①详参拙作《〈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三十五辑。

谕之以学汉人文字,盖欲其兼通经史也。而是书删改其文,曰‘谕之以毋读蒙古书’,则并其事实失之矣”,而《总目》提要仅以“其中谬妄,更不一而足”概之,重申“乾隆壬寅,我皇上御制题词,纠正其悖妄乖戾之失,以辟诬传信”云云,未能举例,说服力稍逊一筹。

四库提要应当以《总目》为代表,需要延伸说明的是,《总目》提要虽然修正库书提要诸多错误,部分篇目还是有讹误遗存。以《东家杂记》为例,文澜阁库书提要有二十四处讹误,《总目》提要遗留十处,今检四条,略作辨证。

(一)《总目》:“是编成于绍兴甲辰”。按:《东家杂记》原题《祖庭杂记》,成书于“宣和甲辰”(1124),增修于“绍兴甲寅”(1134),《提要》误作“绍兴甲辰”,殊不知南宋绍兴年间无“甲辰”也。孔传《东家杂记序》末署“时巨宋绍兴甲寅三月辛亥四十七代孙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仙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借紫金鱼袋孔传谨序”,“甲寅”为绍兴四年(1134)。孔传这篇序,又载于《孔氏祖庭广记》,题《祖庭杂记旧引》,末署“时宋宣和六年(1124)岁次甲辰三月戊午曲阜燕居申申堂记”,序称“纂其轶事,缀所旧闻,题曰《孔氏祖庭杂记》”云云。靖康(1126)之难,阙里家庙,半为灰烬,书版亡于动乱中。孔传随高宗南渡,乃改作序年月,易名《东家杂记》重刊之。九十三年之后,金正大四年(1227),孔元措以孔宗翰《家谱》、孔传《祖庭杂记》为基础增编《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刊版于开封。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孔元措重刊《广记》于曲阜,钱大昕尝据此本暨宋刊《东家杂记》以校正明刻《东家杂记》、《孔子家语》之讹误^①,可见《东家杂记》前身《祖庭杂记》亦有不可磨灭之文献价值在。

(二)《总目》:“上卷分九类:曰姓谱,曰先圣诞辰讳日,曰母颜氏,曰娶亓官氏……。”按,“亓官氏”当为“并官氏”之误。“并官”复姓。汉、宋、元碑刻隶书作“并官氏”,宋本《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刊版楷书作“并官氏”,并、并隶楷相承。考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韩明府孔子庙碑》^②:“孔子近圣,为汉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学,莫不驩思,叹仰师镜。颜氏圣舅,家居鲁亲里;并官圣妃,在安乐里。圣族之亲,礼所宜异。复颜氏、并官氏邑中繇[徭]发,以尊孔,心念圣。历世礼乐陵迟,秦项作乱,不尊图书,倍道畔德,离败圣舆食粮,亡于沙丘。君于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修饰宅庙,

^①国家图书馆藏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曲阜孔元措刊《孔氏祖庭广记》钱大昕题跋。辑入《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

^②碑无额。标题依赵明诚《金石录》。欧阳修《集古录》标题《修孔子庙器碑》、洪适《隶释》标题《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孔传《东家杂记》、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标题《永寿二年鲁相颜[韩]敕复颜氏并官氏繇发碑》。清光绪十四年,董金鉴以木活字重印《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并附续校、续补校(全本辑入《琳琅秘室丛书》),其续补校曰:“此碑不为复繇发而立,标题未当;《集古录》、《隶释》题为‘修孔庙礼器碑’,皆得其一而遗其一。不若《金石录》但题为《韩明府孔子庙碑》之为该也。”

更作二與……。”^①唐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六引《孔子家语·本姓篇》“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与汉碑一致。清人钱大昕嘉庆六年五月五日跋《孔氏祖庭广记》云：“向尝据汉、宋、元石刻，证圣妃当为并官氏。今检此书，‘并官氏’屡见，无有作‘开’字者。自明人刻《家语》，妄改为‘开’，沿讹至今，莫能更正。读此益信元初旧刻之可宝。”钱氏题跋本为钱塘何梦华所藏蒙古乃马真后元年刊本，不久何氏便转赠黄丕烈，黄丕烈跋云：“今夏（按：嘉庆六年）五月，余自都门归，钱塘何梦华亦新自山东曲阜携眷属乔寓于吴中。何固孔氏婿也，其奁赠中有元板《孔氏祖庭广记》五册，装潢古雅，签题似元人书。因出以相示，余诧为惊人秘笈……梦华稔知宋槧本《东家杂记》已在余处，谓此书是两美之合，爰割爱投赠。赠书之日，适梦华将返杭，余赠以行资卅金。今而后士礼居中如获双璧矣。”此孔府原刊原藏本，经杭州何氏、长洲黄氏、常熟瞿氏，今归国家图书馆收藏。钱大昕又有《并官》专条云：“孔子娶并官氏，今人以为‘开官’，其误盖自明始。按汉《韩敕造礼器碑》云：‘并官圣妃，在安乐里。’宋祥符中，封郛国夫人，制词亦作‘并官氏’。此二碑皆在曲阜孔庙。予尝至句容庙学，见元至顺元年加封号制石亦作‘并官’。又见宋版《东家杂记》、元板《孔庭广记》书‘并官’，未有作‘开’者。自明人刊《家语》，误‘并’为‘开’，后来刊《宋史》者，转依误本校改。沿讹三百余年，良可怪也。”^②按，明嘉靖三十三年吴郡黄鲁曾翻宋本《孔子家语》卷九《本姓解》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与孔颖达所引《家语·本姓篇》相同，“并官氏”不误。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清泉刘祥卿刊《新编孔子家语句解》卷九《本姓解》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生伯鱼”，小字双行注“夫子十九岁娶并官氏，乃生伯鱼”。正文“并”字顶端两笔以书版漫漶灭失成“开”^③。明正德十六年（1521）张公瑞刊《孔子家语》何孟春注本，沿误成“开官氏”。崇祯间毛晋汲古阁校刊《孔子家语》，又误作“上官氏”。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浙江范懋柱天一阁呈送明刻本《东家杂记》误“开官氏”，馆臣据此缮写辑入《四库全书》。其中文渊阁库书又改写作“元官氏”，提要因此误作“元官氏”，因错就错，想当然耳。乾嘉以后，受四库提要影响，《孔子家语》传本多误改“元官氏”。余嘉锡撰《四库提要辨证》，批评钱大昕漏引汉碑，实则无的放矢。又引“何义门曰孔子娶于并官氏，自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东家杂记》皆作‘并’，而《正义》中反从流俗作‘元’[开]，若非宋本，何以析疑！”^④按，《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

①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十，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孔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洪适《隶释》卷一、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六载文同。

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并官》篇。

③并、开两字音义不同，详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第323-324页。检何焯《义门先生集》卷五“《正义》中反从流俗作开”（道光三十年刻本、宣统元年刻本），不作“元”。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六引“何义门曰”云云亦作“开”，不作“元”。余氏《辨证》转引字误。

子同生。”《左氏传》：“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取于物为假。”杜预注：“若伯鱼生，人有馈之鱼，因名之曰鲤。”孔颖达《正义》：“《家语·本姓篇》云：‘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并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孔子荣君之赐，因名子曰鲤，字伯鱼。’此《注》不言昭公赐，而云‘人有馈之’者。如《家语》，则伯鱼之生，当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重圣人，礼其生子。取其意而遗其人，疑其非昭公故。”^①孔颖达的意思是说，杜注源自《孔子家语》，但他怀疑送鱼的人不大会是鲁昭公，故“取其意而遗其人”。孔颖达《正义》引“娶于宋并官氏”，阮元《校勘记》：“监本、毛本，‘并’作‘开’。宋本作‘并’。段玉裁作‘并’，与汉礼器碑合。”^②明监本、毛本沿俗本之讹，“并”字失顶端两笔而成“开”，或讹作“开”，四库提要之前绝无作“开”者。《春秋左传正义》宋刻本“并官氏”不误，孔颖达引用的《孔子家语·本姓篇》，其明嘉靖三十三年吴郡黄鲁曾翻宋本亦不误。何氏笼统归咎于“《正义》中”，殊欠分明。

（三）《总目》：“后有淳熙元年叶梦得跋”。按，文澜阁原钞本《东家杂记》卷末录有“咸淳元年三月朔冯梦得谨跋”，称“旧板多漫漶，乃取而重刻之。”冯梦得乃南宋末年（1265）《东家杂记》的最后一位刊版责任人，《总目》误作“淳熙元年（1174）叶梦得跋”，前后相距九十馀年，更早的名家叶梦得（1077-1148）复被无辜牵入其中，徒增淆乱。

（四）《总目》：“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壬戌冬日，叶九来过访草堂，云有宋槧本《东家杂记》，因假借缮写。此书为先圣四十七代孙孔传所编，首列《杏坛图说》，记夫子车从，出国东门，因覩杏坛，历级而上，顾谓弟子曰：兹鲁将臧文仲誓盟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去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考诸家琴史俱失载，附录于此。详其语意，亦未知果为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按此歌伪妄，不辨而明，曾乃语若存疑，盖其平生过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三卷’，此本实二卷；曾云‘首列《杏坛图说》’，此本《杏坛》为下卷第三篇，且有说无图，亦无此歌。不知曾所见者，又何本也。其或误记欤？”按，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云，并非“误记”，正是宋刻本《东家杂记》真实状况。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东家杂记》四册，有明袁则明跋，清黄丕烈、钱大昕跋，黄氏百宋一廬、瞿氏铁琴铜剑楼递藏。卷首版画一帧，孔子杏坛抚琴，弟子十人侍列，线条简洁，生动传神。图左《杏坛说》“昔周灵王之世，鲁哀公时，夫子车从，出国东门，因覩杏坛，逡巡而至，历级而上……”，末有“歌曰：暑往寒来春复秋”云云，图、说、歌俱全。次为《北山移文》（二十九代璋述），《击蛇笏铭》（徂徕先生守道述），《元祐党籍》（四十七代三孔氏）。以上共七叶，版心镌对鱼尾，其间有墨钉，无书名、叶码。次为“东家

^①《春秋左传正义》卷六，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79年，第1749-1751页。

^②《春秋左传正义》卷六，第1753页。

杂记”孔传序(版心单鱼尾,镌“东家记一”)。次“东家杂记上”(篇目、《姓谱》篇正文,版心单鱼尾,镌“东家二”,有刻工“陈□”)。次《先圣诞辰讳日》篇(版心单鱼尾,镌“东家记三”,有刻工“王子正”)。次《母颜氏》、《娶并官氏》二篇(版心单鱼尾,镌“东家记四”,有刻工)。以下至叶码四十(阙第三十六叶),版心皆单鱼尾,镌有书名、叶码、刻工。次“东家杂记下”,叶码另起,计三十六叶,版式同上。次“续添袭封世系”,自“一代文宣王”至“五十三代洙字源鲁居忧拟承袭衍圣公”止;附《四十六代孙宗翰序》、《四十八代孙端朝序》、《五十代孙拟序》,共十七叶,版心镌对鱼尾,叶码另起(一至十七序终),无书名,无刻工。末有钱大昕题跋云:“世文于宣和六年尝撰《祖庭杂记》,及从思陵南渡,别撰此书(《十驾斋养新录》改作“别为编辑”)。改‘祖庭’为‘东家’者,殆痛祖庭之沦陷,而不忍质言之欤?考四十九代孙玠袭封衍圣公时,世文已称‘本家尊长’,而卷中述世系,迄于五十三代孙洙。计其时代,当在南宋之季,盖后来续有增入矣。卷首杏坛图说,与钱遵王所记正同。窃意此图记及《北山移文》、《击蛇笏铭》、《元祐党籍》三篇,亦后人增入,非世文意。堯圃主人精于考古,其以吾言为然乎否?辛酉十一月竹汀居士钱大昕记。”根据版式判断,此宋本《东家杂记》由三部份组成:(1)卷首《杏坛图说》等七叶;(2)《东家杂记》上、下卷七十六叶;(3)《续添袭封世系》等十七叶。三种版式不大可能是同时完成的。上、下卷七十六叶漫漶模糊较多,应该是南宋绍兴四年的原版(或为赵去疾《跋》所云“江西转运司新刻”),经多次修版刷印。“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勺,避思陵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①卷首七叶、续添十七叶则笔划清晰,无修版痕迹。《续添》的编纂者,从冯梦得跋透出的信息看,应该是五十三代孔洙。如此看来,这部宋本当著录作:东家杂记二卷 卷首一卷 增附一卷。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将卷首计入作三卷,不算违规,更非“误记”。《总目》“此本”云云,指的是四库底本,即天一阁呈送之明刻本《东家杂记》,阙讹殊多,执此疑彼,本末倒置矣。但是,宋本所阙之上卷第三十六叶,《四库全书》本不阙,正可互补。清咸丰间,胡珽辑印《琳琅秘室丛书》,不知此处有阙(正当《改衍圣公告》与《乡官》两篇衔接处),径直剪切拼接,造成上篇失尾,下篇无头,形同混搭,难以卒读。借助《四库》本,亦可校补胡氏以及光绪间董氏重印本之不足矣。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丙午,1126),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损失,曲阜孔氏首当其冲。“时有军人发掘二代泗水侯墓,方深六尺馀,又伐破四十六代孙宋刑部侍郎墓”,庙庭“皆为灰烬,而殿火犹未熄”^②,这些都是金兵统帅现场目睹的事实。“宣和末,女真始入寇。靖康丙午,群盗起,家所蓄藏,荡然云散。建炎戊申十月,端朝不得已去陵庙

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东家杂记》条。

②《孔氏祖庭广记》卷三。

南奔”^①。“叔祖父昔年编此[按:指《祖庭杂记》]既成,欲镂版藏于祖庭。值建炎之事,庙宇与书籍俱为灰烬。后二十余年,或见于士大夫家,皆无完本,甚可惜”^②。这是孔氏族人的痛苦记忆。想想我们经历的“丙午之乱”(1966)吧,靖康之难不知要惨烈多少倍!国家分裂,兵荒马乱,中国士人失去了精神家园,“野草闲花满地愁”,正是孔氏族人,特别是孔传、孔端友、孔端朝(南渡后更名端木)等飘零子弟心境的真切写照。“改祖庭为东家者,殆痛祖庭之沦陷,而不忍质言之欤”,微言大义,钱大昕可谓深得其心!“将军战马今何在”呼唤古代鲁国名将,昂扬光复之志,实乃《春秋》大义,一脉直传,虽托名圣人,其情其志,不伪不妄。《东家杂记》下卷《后殿》篇载述:“鲁人相传云,孔子将亡,遗秘书曰:后世一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孔子“秘书”,子虚乌有;假名孔子,谴责秦始皇暴虐无道,掘墓焚书,此乃民意,民心所向,亦不“伪”不“妄”。大凡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之代表人物,如孔子,如屈原,犹如一个开放的巨系统,多少仁人志士,奉为旗帜,发扬蹈厉,“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洪兴祖《楚辞补注》论评屈原语)。

余嘉锡先生撰《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涉及《总目》提要四百九十余篇,搜集证据,推勘事实,有功《提要》,誉满天下。余先生说:“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弥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钜矣,用亦弘矣。”^③《总目》提要有一万二千五百五十四篇(据浙本统计),体大思精,错误概率是很低的(殿本更低),后世辨证、补正之作,所涉各篇,大多主体成立,局部出错;或本无错,只是美中不足,缺点儿什么,例如篇目(卷目)、版本之类。由于底本不善致讹误较多如《东家杂记》提要者,是比较少见的。在中国传统目录学发展史上,《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集大成的标志性著作,最高水平的代表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古籍所

①《四十八代孙端朝序》,《东家杂记》附录,宋刻递修本,国家图书馆藏。

②《四十九代孙瓌谨识》,《孔氏祖庭广记》卷三。

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第48-52页。